

「湖北文史集粹」

经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湖北文史集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 武汉

经 济



目 录

工 交

湖北纱布丝麻四局经营始末	刘源清	(1)
亚洲第一家大型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		
——汉阳铁厂	陈 钧	(16)
华中钢铁公司筹建经过	刘 刚	(39)
我在黄石兴办橡胶工业的回忆	钱福元	(46)
黄石是我国水泥工业的摇篮	余裕嘉	(59)
黄师让和裕大华公司	湖北省工商联	(63)
周恒顺机器厂的发展与经营之道	周英柏 周兹柏	(70)
宜昌最早的李正顺机器厂	杨燮诚	(97)
武汉印染厂公私合营 30 年	平麟伯	(106)
应城岩盐的发现与盐矿的兴建	冯定豪	(113)
沙市电气业的兴起与演变	罗时愚	(120)
长阳小水电开发纪略	向德明 屈定福	(125)
汉丹铁路枣阳段兴建纪实	孙断民	(132)
钟祥雄师战“焦枝”	刘世聰	(137)
黄石市历史上的两条铁路	枫 叶	(156)
情系港澳 多装快跑	湖北省外经贸厅储运处	(160)
三峡民航与宜昌机场	易史惠 郑龙昌	(168)
建国前的湖北公路运输	黄昊松	(176)
巴石公路——鄂西第一条公路	姚守仁	(188)
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卢国纪	(195)

武汉私营轮船业社会主义改造前后	杨子名	(204)
清末民国时的木帆船运输及行帮组织	喻志斌	(209)
记武汉长江大桥正桥建成经过	唐寰澄	(216)
黄石市奠定大城市格局纪实	刘大章	(223)
沙市市政建设	徐源泉	(232)
昔日鲁肃粮城 今朝鄂南新市	王佳兴	(244)
汉口水电事业的由来和演变	贺衡夫	梁绍栋 (249)
30至40年代的宜昌邮政	朱守恩	(259)
始于光绪年间的长江埠邮政局	褚艺军	(267)

农 业

高岭乡土改试点回忆	刘德羽	(273)
全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饶兴礼	(280)
30年农村工作回顾	罗雄飞	(298)
全省第一个拖拉机站	刘顺琦	(305)
“西瓜秧”式灌溉系统的形成与发展	申楚宝	(313)
天下第一田与亩产三万六	郑重建	(318)
我在监利推广农业技术漫忆	唐智颖	(321)
大灾之年粮棉双超《纲要》的回忆	张火增	(328)
建设“吨粮县”的三次攻坚战	胡振岛	(337)
老河口市棉花历年产销情况	罗 淹	(343)
云梦油菜生产发展的历程	杨品三	(356)
通城猪资源的保存与开发利用	姚玉琳 曾凡春	(364)
回顾荆江分洪工程建设	冯自强	(373)
毛主席周总理与丹江口水利枢纽	柳 萍 杨建平	(384)
毛主席对葛洲坝工程的批示	林一山	(391)
周总理带病主持最后一次葛洲坝工程会议	林一山	(403)
万里长江的第一次截流	张文楚	(410)
毛泽东三峡行	杜之祥	(418)

周恩来带队查勘三峡记	李锐	(429)
关于三峡工程论争的历史回忆	洪庆余	(452)
洪湖儿女驯水记	吴道恺 郭兆玉	(463)
监利县长江堤防的历史和现状	刘杨志 贺宗宇	(470)
老河口汉江堤防修建历程	赵伟	(477)
宣城当代水利发展概况	郝铁方	(492)
湖北省 1931 年与 1935 年特大洪水灾情	陈钧	(504)
1931 年武汉大水琐记	汪正本	(511)
我所经历的两次抗大洪大涝	张佑清	(518)
汉江特大洪水调度的前前后后	余敷秋	(533)
1939 年瘟疫蔓延亲历记	程达	(543)
湖北省抗御 1998 大洪纪略	孙又欣	(545)
1952 年应山救灾回忆	谈瀛	(565)
盐池河崩山纪实	樊家寿	(581)
1958 年的特大雹灾	易冰	(585)
闪烁的绿宝石	丁建国	(590)
泽被万世 功照千秋	胡为民	(599)
天然木园满藏奇	唐方正	(603)
葱葱馨香醉人心	朱伯豪	(606)

财 贸

旧社会湖北省财政概忆	教家楣	(611)
回忆湖北省银行	徐匡涛 何有藻	(623)
回忆旧湖北省信用合作社	姜德一	(641)
中央合作金库湖北省分库的发家史	曹煥	(647)
抗战胜利后的汉口钱庄业	何瑞保	(652)
建国初期恩施地区的财经工作	王宗田	(662)
钱庄和典当	张光祖	(672)
旧汉口的外国银行	武文士	(681)

- 旧中国的宜昌洋行 冯锦卿 (687)
汉口日信洋行的一些情况 袁范宇 (693)
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概况 江永升 陈鹤皋 (705)
旧社会沙市的行帮组织与工商关系 毛鸿峰 (713)
恩施城商业市场演变史略 袁简之 (725)
湖北及武汉建国初期的市场斗争 沈以宏 (736)
洪湖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刘孟熙 (747)
建国前后的武汉工商界 王际清 (758)
中国四大中药店之一的叶开泰 叶元同 (764)
汉口汪玉霞发展史 羌 明 (774)
大买办刘子敬的兴衰 董明藏 (786)
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 董明藏 (800)
曹祥泰发家史 曹美成 曹实生 (809)
昔日汉正街 蒋明璧 (824)
武昌鱼和大中华酒楼 袁复心 (830)
蒲圻羊楼洞义兴茶砖厂 雷启汉 (835)
“楠竹文化”考 涂昭镜 (841)
桂花之乡——咸宁 徐孔章 (851)
别具风味的孝感麻糖 朱幼勤 (855)
驰名中外的利川坝漆 刘成周 (857)
来凤“金丝桐油”产销概况 叶明理 田 勇 (861)
南漳黑木耳 查代安 (866)
云梦鱼面史话 宋永清 (871)
鸣风优质米 李顺森 (877)
黄石港饼 阎诗景 (880)
襄阳大头菜 张良一 云 杰 (883)
荆庄大布之产销 赵振业 (886)
漫话黄梅挑花 程江林 余绍青 (895)

- 旧汉口海关——江汉关 余心香 金来刚 (902)
宜昌海关史略 邓德耀 李进都 (908)
沦陷后的应城石膏股份有限公司 樊恺清 (937)
日伪控制下的“武汉合作社” 宋少白 (953)
日军在沦陷区掠夺金属物资纪实 张孟青 (959)
武汉沦陷大量出口物资被日军掠夺 邓葆光 (963)
武汉沦陷时期日军对棉纱棉布的
 控制与掠夺 唐兰樵 胡笑如 (967)

工 交

湖北纱布丝麻四局经营始末

刘源清

湖北武昌纱、布、丝、麻四局（以下简称四局），系湖北纺纱官局、湖北织布官局、湖北制麻局、湖北缫丝局的简称。其建成投产的先后顺序：织布官局为光绪十九年（1893年），缫丝局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纺纱官局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制麻局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局的厂址：前三厂设在武昌文昌门外至平湖门外江边，即横跨现在的紫阳路南北地段。缫丝局设在武昌望山门外的皇殿之西旧有官地上，即现在的保安街南侧。四局厂基，占地一万九千余方丈（约266市亩），规模最大的为织布与纺纱两官局，缫丝、制麻两局则规模较小。织布官局与纺纱官局江边，均自设轮驳码头及起重设备，夏季水涨时，行驶在申汉线的最大轮驳，亦能靠岸，并有轻便铁路直达厂区。全部建厂费用，共达纹银五百余万两，其中购置机器及动力设备，则达三百一十万两。

当时，这样大型纺织企业，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现仅就织布、纺纱两官局的建厂及经营情况加以记述，缫丝及制麻两局则略及之。

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八月初六日（1889年8月31日）向清廷递呈“拟设织布局摺”称：“窃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光绪十四年（1888年），销银已近五千两。……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其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不堪设想，今既不能禁之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工商之利，以保利权。……”这种防止利权外溢兴办纺织工业的出发点，当然还是值得称道的。

在张之洞递呈这封奏折之先，他已与广东善后局的司道详筹熟商打算由官府筹款垫办，“俟办有规模，再陆续招集商股”。当寄去国产棉花样品，托英国制造纺织机械的厂家考验，据复认为能纺棉纱，织造原色扣布、斜纹布及原色次等布，如欲织上等布，需掺美棉半数。同年七月，即电使英大臣刘瑞芬向英国喜克哈葛里甫公司订购了包括运费、保险在内的价值白银四十余万两的布机1千张，纱机3万锭及印染、浆漂、提花、锅炉、动力等机器设备全套，计划建织布厂于广州市城的河南地段。

光绪十五年（1889年）秋，张之洞由两广调任湖广总督，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18日）到武昌就任。两广总督的继任者是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张之洞已经订购好了的纺织机器他不愿接办，所以，张到鄂接事后，即于十二月二十八日（1890年1月18日），电使英大臣刘瑞芬，“纺织机请饬运鄂”，准备在武昌省城内设厂。

光绪十六年春（1890年），选定织布官局厂址于武昌文昌门外江边。张之洞派道员蔡锡勇为该局总办（后来兼管纱、麻、丝三局）。是年夏，机器陆续运到厂地，开始鸠工聚材，建造厂房、

安装机器，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春全部建成。在建筑安装和试产的时候，英国厂家派来了以总监工摩里斯为首的洋匠9名，负责安装机器和传授生产技术。建成后的织布官局门前，两侧镌有铜质的“经纶天下”，“衣被苍生”的大字对联。据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日（1893年3月17日）《捷报》第50卷载“武昌织布官局纪实”称：到织布局参观的人，在一座宽敞坚固的石砌码头上舍舟登陆。这码头在水涨时可容最大的轮船停泊。码头上有起重机，还有路轨直通局厂，因此装卸货物非常便利。厂地四周有高墙环绕，每个门都有卫队把守……今天一切都已安装好，即可全部开工……发动机2台，1千匹马力，可开足至2千匹马力……全厂照明都有电灯，共安装31140盏……就其设备而言，它包括了纺织、印染，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全能工厂。

关于建厂的经费和股本，张之洞在督粤任内，是打算用广东的“闱姓”捐来解决的。原来广东每于乡会试，盛行一种赌博。试前，博者预卜得中人之姓氏，各入资若干，各指定若干姓，视所卜中者之多寡，定所得者之厚薄，这样叫做“闱姓”。张之洞以建厂缺乏资金，劝令“闱姓”商人纳捐，计光绪十五年各商所认数为四十万两，次年为八十万两，官抽百分之八十，可得九十六万两之谱；以之建设织布厂，尚可敷用。不料张之洞调督湖广，后任李瀚章则想赖账，原来订机及包括运费保险的四十余万两，除了湖北官库已垫付的二十二万九千余两，李瀚章允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闱姓”捐款中归垫外，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闱姓”捐款，李瀚章只允拨给十六万两，后经张之洞奏索，始又付购机欠款一十七万四千三百余两，机器运费、保险四至五万两，共计从“闱姓”捐款所得，不过六十万两。另外，加上张之洞督粤时借用山西善后局年息九厘的二十万两，奏准拨鄂充作建厂之用，合计筹得经费约八十万两。不料原订机器运鄂建厂安装时，发现轧花机具各项配件及厂房建筑所需各项铁

料不敷应用，于是又向原厂补订，耗银三十余万两，前后两次订机，已花去七十余万两，这就造成了不但建厂开车及其各项开办费用至少需银二十万两，大部份没有着落，而储备棉花，添补修理机器各件，以及华洋工匠薪金等项流动资金，均须另筹，乃再度举债，除向商号暂借外，并将湖北藩司善后局存当生息之善举公款十万两及鄂省司局所积存之质当捐八万两均提出应用，照章付息。是则织布官局厂未开工，就已造成债台高筑，先天不足局面。加之开工后经营管理不善，资金周转困难，最后到了捉襟见肘，罗掘俱穷的绝境。

二

纺纱官局建成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在筹建织布官局中几乎已同时进行。光绪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1890年6月9日），张之洞致电使英大臣薛福成（本年三月薛福成代刘瑞芬任使英大臣）：“中国绵纱销流最广，利亦最厚，前定纱机仅供织布之用，今拟添纺纱机一倍，另轧花机炉全副……”后来张之洞一面筹款，一面与薛福成函电相商，并要求薛福成向制造厂家提出购机分期付款的办法，没有成功，改向上海良济、瑞记两洋行订购，订机价款计8万余英镑，约合纹银八十余万两，在筹款（包括招集商股三十万两，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分两次拨还）与订机办妥后，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年十月三日（1894年10月31日），向清廷奏报《增设纺纱厂摺》内称：“……近来体察沿海各国商务情形，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銷尤广，……当经督饬局员详加筹备，惟有招商助官之一法。现已招集商股，订购纺纱机器，即在鄂省文昌门外附近织布局购地，添设南北两厂。……配合湖北棉花，能纺十号至十六号纱，订购新式上等精利机器全副，纺纱机九万另七百余挺（即锭），以及各项机器。……目前机器尚

未运到，所收股票票款即可暂借，拨充铁局、枪炮局之用；俟纱厂办成，则布局之气势愈厚，每年盈余大可佐助铁局经费……”原来，张之洞兴办纱局，除了看到洋纱进口日多，自办纱厂借堵漏卮外，还有以布、纱两局之盈余，佐助铁局经费之打算，由于清廷政治腐败，企业管理不善，最后都难免和铁局一样，以招商承办而告终结，所谓“佐助铁局经费”，终于落空。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纺局订购的机器由英国曼彻斯特运抵武昌厂区，开始厂房建筑及机器安装工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建成投产。

三

光绪二十年（1894年）秋，清廷已决定调张之洞任两江总督，农历十月中去江宁（即南京）赴任。在离开湖北之前，于光绪二十年十月五日（1894年11月31日），向清廷奏报“开设缫丝局片”。清廷出于对张之洞的倚重，同月二十七日（11月24日）发上谕：“……湖北炼铁、织布各局，均经张之洞办有头绪，现虽调署两江总督，所有各局应办事宜，仍著该督一手经理，督饬前派各员，认真妥办……”。因此，张之洞虽调署两江，还遥控湖北。当织布官局建成投产并筹建纺纱官局的同时，缫丝局的筹建工作，已开始进行。张之洞认为，湖北土产，除茶叶系销外洋，尚可岁获巨款外，殊少畅行之货；湖北虽亦产丝，而制造不精，销流不旺。他看到上海，广东等处商人，仿照西法用机器缫丝，较之人工所缫其利可增3倍，专售外洋，行銷颇旺，遂计议创办机器缫丝局，以达到“官开其端，民效其法，庶可渐开利源”的目的。于是将湖北蚕茧寄往上海，用机器缫出，发现质性甚佳，与江浙之丝相去不远。派人往江浙一带采办桑秧、蚕子等良种，在湖北推广。由湖北善后局，盐道筹款四万两及其他公款

共计八万两，包括筹集商股，开办费共达四十七万两，作为修建厂房，订购机器动力及蚕茧之需。委派家道殷实，在上海开设机器缫丝厂有年的候选同知黄晋荃负责缫丝局的监制事宜，员司由黄晋荃选用，生产、经营，俱责成黄晋荃一手经理，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后，下车伊始，即于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九日（1894年11月16日），致电上海道刘麒祥：“瑞记洋行承办湖北丝厂机器，业已完工，该道即发免费出口护照，约一千担”。筹建及机器安装工程，光绪二十一年五月（1895年6月），全部完成并开工生产，拥有釜数300盆，职工人数470人，每日能制生丝等品30斤，普通品十八九斤，成为长江流域最大的缫丝厂。后因亏损，黄晋荃亦不愿再办，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停业。

四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之洞又奏准设立制麻局。先是布局总办蔡锡勇已在平湖门外购得空地一处，面积约计2634亩。嗣经道员王秉恩与德商瑞记洋行订立制麻机器合同，连同车运、保险费用计价14043英镑，约合纹银十余万两，再加上购置地皮，建筑厂房，安装机器及一切开办费用，总计用去纹银二十四万两。光绪二十三年七月（1897年8月），聘用日本技师开始筹办，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机器装妥，次年开始生产。制麻局分第一、第二两工厂。第一工厂拥有织布机100台，纺细麻机66台，缫丝机及其他机具19台，引擎4台，锅炉3座，发电机1台。第二工厂拥有织麻布口袋车8台，织宽台布车18台，织麻帆布车14台及其它切、纺、染、整各项机具。两厂内分纺纱、织布、提花、漂染、锅炉、发电等车间。产品计有中西时花各样缎匹，芝麻各色并细纹、斜纹各色麻布、柿色军衣麻布；新

式各花大小麻织台布，麻袋布及粗细各号麻纱等。设备先进，为我国当时极有希望之制麻工厂，且湖北盛产麻类，尤有建设制麻工厂之优越条件。

五

在劳动工资方面，织布局有职工 2000 人，纺纱局有 1500 人，缫丝局有 470 人，制麻局有 430 人，四局共计 4423 人。官办时期，除了丝、麻两局雇有女工外，布、纱两局由于张之洞认为雇用女工违反道德和孔子教义，则全系男工。劳工种类有监工、值车工、包装工、炊事等；劳动等级分为机器匠、工头、长夫、粗纱、正车、帮车等 6 种。四局工头，一般都是雇用湖北本地人。雇用办法，采取通过亲友请托或请雇用亲戚朋友子弟的办法，学艺方法是少数派往上海机器织布局学习，大部份则在本厂先当学徒，练习技术，然后通过所谓“查工”，考核技艺，一二年成为帮车，四五年成为正车，逐步升级。这些学徒工，年龄从七八到十七八岁不等，绝大部分是童工。据《支那经济全书》第十一辑载：“……厂内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实在多得很。”

建成投产最早的是织布官局。初开工时，每天生产 10 小时，但不久即延长至 13 小时。光绪二十年十一月（1894 年 12 月），布局两班工人招齐，即开始两班生产，昼夜开工。这些男工和童工，进行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白班从上午 6 时至下午 6 时，中午午饭包括进食，有 1 小时的休息时间；夜间则不停工，工人以少量食物充饥，找机会吃掉。据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1893 年 11 月 3 日）《捷报》转引布局英籍总监工德金生致英国曼彻斯特一家报纸的信中说：“……这个工厂中的工人都是男工和幼童，没有女工。……（工人们）离开工厂出去散步的机会很少，因为厂中作工是从早晨五点钟到下午六点钟，每隔一个星期日才休息

一天。他们瘦到只有皮包骨头，五十人里面，也找不出一个体格健康的人。”更为严重的是厂方通过监工，对工人进行残酷的统治与迫害。在车间，监工拿竹片，任意毒打工人，迫害工人的办法有笞杖、停工、赔偿、解雇等项。笞杖最轻，巡回监督人对某工人的工作认为不如意时便用手中的竹片打下去。所谓停工，就是罚工，轻则半日，重则数日，无偿劳动。所谓赔偿即对损毁器物者要偿付相当代价。所谓解雇，即职工技术不能胜任或因疾病在工作上有了间断等等。

厂方还忽视工人人身安全，车间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锅炉没有安全阀，机器没有防护罩，据《中外日报》1900年元月13日载：“织布局……滨江汲水机器锅炉，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一九〇〇年一月五日晚间因司火者上煤太多，以致力涨炸裂，轰毙四人。内有两人系过路者，尚有一尸落入江中，迄未捞获。”至于值车的童工，轧落手臂的，砸掉脚趾的，则时有所闻，未能引起厂方的重视。因机器事故而出现的工伤死亡事件，“没有成文的抚恤法令，经确定属于因公死亡或致残的‘格外体恤’，才有少量的抚恤费；那些因繁重的体力劳动致疾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厂方则拒之于门外，除名了事。

关于工资收入，极其微薄，派赴上海机器织布局学艺的意工，每月只能领到工食银一元五角；厂里的熟练工人，月工资则为三千五百文至三千七百文，约合银元四至五元；经验丰富的工头及锅炉工，机械工等，月收入才有十元以上。《布来克本商会访华报告》（1896—1897）承认，中国工人虽然收入微薄，但与那些从英国派来安装机器，月收入达三百便士，约合银元二十元以上的工人一起工作，能和他们一样熟练地安装并修理机器。他们工作得十分出色。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一开始与先进的生产技术相接触，就显示出了他们的才能。“他们在手艺的轻巧方面是特出的，同时，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十分适于纱厂工作。他们现有

特出的耐性，例如，汉口纱厂的童工，通夜工作，不离开纱厂，仅仅只带有一点稀粥作为粮食。”

六

关于生产与经营情况。丝局开工 2 年（光绪二十一年五月至二十三年四月）即告停业，麻局于招商承办时尚未建成。因此，在官办时期经营才有成效，波折起伏层出不穷的就是布、纱两局。光绪十九年（1893 年），布局正式投产。生产的布匹有原布、斜纹布、花布、面巾等项，棉纱有 10 支，14 支及 16 支 3 种。开工之初，由于缺乏市场调查，产销关系不摸底，生产出来的纱支以织布为主，少量外销。光绪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棉布的年产量曾达 7 万至 10 万匹。后来在实际经营中，运往四川和本省鄂西的棉布滞销，又转运长江下游各地。光绪二十一年布局尚积压棉布 7 万匹，而棉纱（当时称洋纱）因四乡织户需要，销路较好，于是减产棉布，以增加棉纱的销量。光绪二十五年棉纱的年产量曾突破 4 万担。因此，在官办时期的布局，布机 1000 台，实际只开 600 台，开工率仅 60%。为了打开销路，布局曾派人到四川等地按出厂价（只加运杂费）推销，“期价轻可广招来而夺洋庄利权，”也没有起到什么有效的结果。同时，布局活本（即流动资金）严重不足，棉花的上市又有淡旺季之分，由于资金不足，不能在棉花旺季上市价低时多进，故常在淡季高价进花。据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1895 年 8 月 27 日），总办蔡锡勇致张之洞电（此时张之洞调署两江，清廷谕张对湖北各厂一手经理）：“……本局十六号（支）纱，每包三百斤、售价六十两五钱（纹银，下同）。……数月来花价奇贵，通花（即河北通州花）每百斤实银十三两四钱……每包摊工费银九两五钱。”按照这个材料粗略计算，每包 16 支纱（包括棉花损耗）只有毛